

中国的进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张志洲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逐渐形成的，其本质内涵是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而不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吸引外资大国，换句话说，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动荡和滑坡的状态下，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避风港。

毛泽东早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一文中，就论述了新中国对世界要做更多贡献的意愿，“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如今，新中国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岁月，回顾和梳理六十年来她对于世界的贡献，不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从根本上说，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的，而总结六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成就与特点，今天国内外的舆论将之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甚至干脆叫“中国奇迹”。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肯定，而且包含着对中国发展模式之成功原因进行探讨的愿望。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当然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不过，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远不止如此。一是中国向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提高现代化水平的努力，甚至无私地给予帮助。1955年的亚非会议，就是一次亚非发展中国家不仅协调政治主张，而且商讨经济发展合作的会议，中国在这次大会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此后的20世纪60至80年代，在世界发展的南北格局之下，中国一方面无私地援助一些亚非拉兄弟国家（对非洲坦赞铁路的援建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特别是在南北对话中，中国发挥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头作用。随着在改革开放政策下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更尽自己所能地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欠中国的债务给予减免，仅2005年中非论坛上中国就宣布免除非洲31国欠华到期债务156笔，共计109亿元人民币。二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如今中国是世界上各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东盟、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最大的或第二位的贸易伙伴。如果说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的援助和施救政策还是牛刀小试，那么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风险能力、扩大内需的潜能以及对西方主要大国的采购能力，特别是作为第一大美国债权国的负责任行为，就是挽救世界经济的强心针。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除了投资、项目合作、贸易等通常的形式外，还表现在中国对越来越多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输华产品免关税，帮助它们培训各类经济和建设人才，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列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国等等，这些措施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吸引外资大国，换句话说，在当前是经济处于动荡和滑坡的状态下，中国成为

世界资本的避风港。自去年起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美国，居于世界第一位。

今天，中国道路的成功表现，向世界表明了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不同于西方老路的新的制度模式，一种新的发展选择的可能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贡献

通常20世纪被认为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而冷战后舆论呼唤的是“超越意识形态”。不过人们可以超越某一种意识形态，却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本身。一个现代的政治国家，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而凡是意识形态总是要影响人的，并最终总是要影响世界的。西方所极力推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对世界进步、对人类解放的实践意义和思想贡献，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前三十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时代与国际形势变化了，革命的主题淡去，而国家建设的主题更加突出，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逐渐形成的，其本质内涵应该有两条，一是中国也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而不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二是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发展是在冷战后时代特殊的背景之下。在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所谓“民主化第三波”在世界汹涌以及1991年底苏联解体和制度转变、西方似乎彻底赢得冷战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另一方面是“历史终结论”思潮弥漫世界。几乎是在全世界都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唯一“正确”的价值观、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挽救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西方道路之外探索另一种更适合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制度模式，是在“华盛顿共识”之外寻找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最终有了“北京共识”的赞誉。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